

# 中国生育研究现状与问题\*

## ——基于方法视角的观察

宋 健 郑 航

**【摘 要】**基于 2016~2021 年生育相关的经验研究文献,文章从方法视角总结和梳理中国生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当前生育研究围绕中国的生育水平、低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如何提升中国的生育水平 3 个核心问题既产生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也存在许多争议和困惑。从方法视角观察,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缺乏有效互补。定量研究主要聚焦低生育率的描述、解释、应对策略等,注重数据估计、因素分析和政策评估,对主观态度类问题探讨不足、理论创新不够、政策建议较笼统;定性研究聚焦生育文化、生育过程、特殊人群的生育困境等,注重文化理解和实地调查,对低生育问题关注不够、理论视角单一、研究主题边缘化。在持续低生育水平和生育政策宽松化背景下,进行方法融合,取长补短,有助于生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关键词】**生育政策宽松化 生育研究 低生育率 研究方法

**【作 者】**宋 健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郑 航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 一、引 言

自 1992 年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迄今,中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生育政策不断进行宽松化调整。新的人口形势和政策环境对人口学科提出研究方法与新理论的新挑战。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两类主要范式。注重定量研究是人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随着中国人口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单纯的定量分析难以完全解决复杂而多元的人口问题,开始思考并探索在人口相关研究中使用定性方法(宋健,2018)。近年来,中国生育研究围绕着当前的生育水平、低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如何有效提升中国的生育水平三大核心问题开展。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使用

---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低生育率背景下育龄家庭的生育机制与生育支持研究”(编号:20ARK005)的阶段性成果。

定量方法,辅之以定性方法进行研究拓展;以生育成本理论为基础,补充以文化理论、制度理论等视角;既产生了诸多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也存在许多争议和困惑。

2016 年是中国生育政策宽松化调整和生育研究转向的关键节点。本文基于 2016~2021 年国内与生育相关的经验研究文献,从研究方法的视角总结和梳理中国生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

## 二、生育研究的核心问题

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研究依然保持着定量取向为主的传统,即通过数据的更新、模型的改进、理论视角的拓展等积极回应当前生育领域的 3 个核心问题。

### (一) 当前中国的生育水平

对生育水平的判断决定对人口形势的把握和未来诸多政策的走向,真实生育水平是当前生育研究需要回应的首要问题。虽然关于生育水平的研究较多,但对于真实生育水平的判断仍存在争议。其中一个原因是有些学者对总和生育率时期综合指标的性质不能准确把握,将其与终身生育率相混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研究结果的误读。争议焦点是人口调查数据应该如何评估与调整,以及客观层面的生育行为和主观层面的生育意愿存在怎样的差距。

#### 1. 总和生育率的争议与共识

总和生育率(TFR)是反映客观生育水平的主要指标,总和生育率 1.5 是更替水平以下的一个关键界限,并由此判断生育形势是否严峻。当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总和生育率在 1.5 以上处于适度低水平(陈卫,2019;王金营等,2019),另一种观点认为,总和生育率已低于 1.5 的警戒水平(姜保全等,2020)。产生争论的原因是自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以后,国家不再公布总和生育率官方数据,而不同学者基于各自的数据和方法进行修正和计算,产生不同的答案,导致对真实生育水平判断的分歧。2020 年官方公布总和生育率为 1.3,但这一数据的准确性和背后意涵还有待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深度开发。

在争论总和生育率具体数值的同时,关于中国的生育水平,学者们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一是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即使实施宽松化生育政策也较难改变这一局面;二是追求时期生育率的准确数值并不现实,判断总和生育率处于 1.5 或 1.3 哪个范围对未来人口发展才更为重要;三是持续低迷的生育率不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必须努力落实宽松化生育政策,以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 2.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偏离

生育意愿是育龄人群生育孩子的主观想法,其作为生育水平的预测性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育水平的提升潜能,是生育研究的重要维度。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

为往往存在偏离,一般有两种方向:意愿小于行为主要发生在生育转变之前或过程中,体现为非意愿生育,减少偏离的措施是可及且普惠的计划生育项目的实施;意愿大于行为主要发生在生育转变之后,体现为未满足的生育需求,减少偏离的措施是积极生育支持体系的完善。

随着中国生育转变的加速完成,曾经较为普遍的非意愿生育已逐渐转变为未满足的生育需求,生育意愿表现为高于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及其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开始受到关注。当前,生育研究在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主要使用“理想生育子女数”“打算生育子女数”和“计划生育子女数”等对生育意愿进行描述,这3个指标的数值依次由高到低,向现实的生育水平趋近(庄亚儿等,2021)。有研究发现,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向度平均约为0.14个孩子,说明当前育龄女性中还存在未满足的生育需求和待开发的生育潜力(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2021)。学者们一般使用邦戈茨的低生育率模型,聚焦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偏离的抑制性和促进性因素进行分解及分析,试图用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性分析解释出现低生育率的原因,认为低生育率是生育抑制性因素影响的结果。中国虽然有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但非政策性因素的抑制作用也很显著(王军、王广州,2016)。缩小生育意愿与行为间的差距,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成为一种共识。

### 3. 生育意愿研究的新挑战

即便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缩小二者差距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但中国的生育意愿数值已低于更替水平,且存在继续降低的风险(王军、王广州,2016)。中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这种“双低”态势,说明减少乃至消除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抑制性因素,并不是有效提高生育水平的根本途径,因此探索提升结婚和生育的意愿成为深化生育研究的重要议题。

然而,当前生育意愿研究成果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现象,一些采用相同方法的研究也得出不一致的结果,影响人们对生育意愿的正确认识。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对研究方法的反思不足、造成方法上的偏误,如在研究对象性质上,城乡混合研究和城乡单独的研究成果混淆导致了结果不一致;另一方面是缺乏不同研究之间的对话,没有就不同的研究结果展开讨论(风笑天,2018)。深化生育意愿研究带来了传统生育研究方法的挑战。因为生育意愿的测量方法与生育行为不同,生育意愿是主观性变量,更可能受主观性因素的干扰,也会直接影响定量统计方法的有效性。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不同调查问卷的设计者对生育意愿诸多指标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调查对象时常对“理想子女数”“期望子女数”“计划子女数”等话语表达产生困惑,并在回答时表现出主观任意和不确定性;在数据分析过程中,多数学者注重调查结果的客观性、稳健性,忽视了某些变量本身可能存在的主观性偏差。生育意愿具有内蕴意涵丰富(如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呈

现为期望、打算、计划等),会随着生命历程和生育经历而变动,以及受文化和政策直接或潜移默化影响的特点,需要更具新意的方法数据和分析思路推进相关研究。

## (二) 新时期低生育水平的理论解释

在长期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中国快速实现了由高生育水平向低生育水平的转变。目前,生育数量的限制逐步解除,生育自主权开始回归家庭和个人,生育水平却仍较低,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成为热点和难点。相关解释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分析直接影响低生育水平的人口变量,例如,从人口内部要素出发,把年轻人群的婚育推迟效应强劲、一孩总和生育率降低和政策放宽后年长人群的生育补偿效应微弱、二孩总和生育率提升有限视为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郭志刚,2017;顾宝昌等,2020);另一方面是在人口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人口内部要素与外部经济社会因素的关系,寻找解决低生育难题的社会方案,因而产生了多种理论解释。这一类生育研究通常是在某一种理论预设下,依托宏观和微观数据,分析影响低生育率的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这类研究涉及变量众多,理论观点庞杂,而对作为核心的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问题,理解不够清晰。已有文献对低生育水平的解释往往从以下理论依据出发。

### 1. 生育成本—收益的比较

自马尔萨斯以来,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受到高度重视,不仅体现为宏观层面人口要素与经济整体发展的相互作用,也体现为中微观层面经济因素对人们生育意愿及行为的影响。低生育率相关研究基于贝克尔等人的经典家庭经济学理论,认为生育成本的上升和生育收益的降低影响家庭的生育决策,并造成整体生育水平下降。

寻找抑制生育率的经济因素是该类研究的主要内容。具体可分为两种研究路径,一是通过因素分析法,分析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下降的因素,并以生育成本的上升作为内在逻辑的解释;二是通过假设检验法,假设生育成本上升由一个或多个重要因素引起,检验其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多个影响因素如人口乡城流动(杨华磊等,2018)、房价上涨(葛玉好、张雪梅,2019)、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何兴邦,2020)、收入增长放缓和收入下降的预期(李子联,2016)、服务业比重提高的结构转型(郭凯明等,2021)等均使生育成本提升、生育收益降低。

尽管生育成本—收益相关理论获得了大量经验数据支持,部分解释了育龄人群减少生育的原因,但生育成本上升和生育收益下降只解释了育龄人群何以减少生育,不能有效解释育龄人群将生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的动机,即无法有效解释低生育率。此外,这类研究虽然集合了影响生育率下降的诸多因素,对低生育水平进行了初步解释,但缺少相对全面综合的解释框架。就方法和数据而言,一个重要原因是生育问题与社会经济诸多因素均有联系,变量分析往往挂一漏万。例如,高收入人群的“生不起”问题未必与经济原因直接相关,可能涉及培养质量和成本预期等变量。已育人群的再生育行为不仅



受制于家庭经济水平,也可能与已有孩子的抚养经历、身心体验等相关,专项调查问卷设计中变量的局限性使模型分析时的遗漏变量问题几乎无法避免。就理论视角而言,源于西方经济学的生育成本—效用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本土文化、能否解释中国当前的生育行为尚存争议。

## 2. 女性角色与地位的变化

育龄女性是生育责任的直接承担者,生育过程主要由育龄女性来完成,女性的角色和地位的变化成为低生育率的有力解释之一。这类研究基于女性主义理论,将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关注女性在家庭、职场、教育、两性关系中的变化,并通过女性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的降低来解释低生育率。

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育龄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变化进行研究。例如,在结构视角下,关注女性参与就业对生育的负面影响,认为育龄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会受到生育惩罚,从而减少了女性的生育动力(廖敬仪、周涛,2020)。在工作与家庭冲突的视角下,关注职场女性加班与结婚、生育的关系(张婷皮美、石智雷,2020),发现儿童照料资源的获取有助于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提升二孩生育意愿(田艳芳等,2020)。从教育变迁的视角,关注个体受教育程度或教育制度对生育水平变动的影响(张丽萍、王广州,2020;江涛,2020)。从性别视角出发,关注两性在生育偏好和决策上的差异及相互影响(卿石松,2020)。

然而,生育行为不是女性个体的独立行为,育龄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变化内嵌于家庭和社会变化之中。中国婚姻家庭虽然发生了很多显而易见的变化,但婚内生育仍是最普遍的生育形式,家庭仍是生育行为得以发生的基本场域,不能忽视家庭转变对女性及其生育意愿和行为的重要影响。此外,在女性角色和地位发生变迁的同时,与之相对应的男性角色和地位也在变化,男性生育意愿和行为的降低也值得关注。目前相关研究一般把育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虽然开始关注夫妻比较或加入家庭视角,但就方法和数据而言,获得配偶或家庭的数据资料提升了调查的成本和难度,女性与家庭的互动过程也难以用少量指标进行充分衡量。

## 3. 文化与制度的变迁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育不仅受到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也受到改革开放、社会文化与制度变迁的影响。文化与制度的变迁也是低生育率的重要解释之一。这类研究的基本假设是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对生育意愿和行为产生了抑制性的影响,解析低生育的制度环境和低生育文化是其最主要的路径。例如,有研究发现,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动机构成了现代中国生育实践解释的双重路径,在现代社会的代际变迁过程中,由于鼓励生育的家庭主义动机在减弱,而抑制生育的个人主义动机在增强,使生育水平难以提升(陈滔、胡安宁,2020)。在生育政策宽松化背景下,二孩家庭的绝对收入向下流动且幅度不断增大,收入位次向下流动的可能

性也大大增加,抑制了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陈云等,2021)。就现代社会的分层机制变迁而言,人们不是因为收入低养不起孩子,而是向上流动的欲望制造了更多地位消费,造成了人们的生育预算减少,挤压了生育意愿(陈卫民、李晓晴,2021),而生育意愿更多取决于个人对自身能力的判断,高收入女性群体会参照自己所处社会阶层的相对位置,做出是否生育二孩的决策,绝对和相对阶层地位都较高的女性生育二孩的可能性较大(曾远力、赵丹,2020)。此外,养老模式也发生了变迁,有学者认为,商业养老保险和社会化养老弥补了家庭养儿防老功能弱化的不足,孩子的生育供给与抚养成本由家庭承担,而养老收益及外部性被社会分享,从而抑制了家庭的生育意愿(王国军、高立飞,2021;周立群、周晓波,2016)。

文化与制度变迁理论结合宏观的社会变迁与微观的个人决策,为低生育率的解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然而,该类研究一般是把复杂的社会文化变量进行了操作化处理,强调理论推演和统计检验相结合的方法,但操作化的变量往往具有某些局限性,经验证据对研究结论的支持力度还存在争议。

总体而言,基于上述各种理论进行的低生育水平的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明显的相互矛盾之处。如生育成本虽然上升,但家庭的收入能力也在提高;女性的角色和地位在发生变化、生育意愿下降,但生育并非女性个体的责任,还涉及家庭的决策,个体的生育意愿与家庭中其他成员的生育意愿未必一致;一些文化和制度因素削弱了生育的动力,同时国家政策等也在努力增加生育的动力。各种生育理论还缺乏深入对话、相互借鉴,生育机制的分析多停留于影响因素的分析,未能深入。机制分析是对因果关系链的探索,而探索因果关系链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目标,影响因素只是初步获得变量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行因果关系探讨。

### (三) 如何有效提升中国的生育水平

无论是关于真实生育率数值的争论,还是对低生育水平的不同解释,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构建完善的生育政策,这是由中国生育研究的应用性传统所决定的,也是社会科学资政功能的重要体现。中国处于低生育水平已经是共识,采取措施有效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是大势所趋,为此,一些研究结合政策文本和数据分析,综合评估国内外各种相关政策,并以此作为调整出台中国生育支持政策的依据。近年来,国内的政策分析包括儿童照料、经济激励、保障体系的需求性分析,提出改革旧有的产假制度为“家庭生育假”制度(黄镇,2018),按照托育服务提供、二孩税收减免、养育指导与产假延长及二孩现金补贴的层次顺序构建儿童照料政策体系(杨雪燕等,2021),对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增值税等进行优化,通过多种途径降低家庭育儿成本(闫晴,2020),提高生育保险去商品化水平,建设妇女儿童社会福利体系和育儿社会服务体系(贾玉娇,2019)等。总体而言,学界普遍接受生育政策要适应人口形势和社会环境的观点,建议完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

除了将政策文本和数据分析相结合,也有学者将定性方法作为定量研究的补充,用以探讨生育决策机制和支持政策的实施办法。例如,钟晓慧、郭巍青(2017)在结合宏观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观家庭调查,发现城市中产家庭试图通过“隔代抚养”策略实现代际合作,以转移和分散儿童照顾的压力,但祖辈照料一孩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其不愿意照料二孩,因而应建立以儿童照料为重心的支持体系。陈秀红(2017)对城市女性进行二孩生育访谈,发现家庭的照料压力仍然有较为明显的家庭化倾向,而中国当前的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较弱,导致生育的家庭经济压力大、生育意愿低,因而社会政策的完善应当注重“去商品化”能力的提升。对于如何有效提升中国的生育水平,构建怎样的政策体系,仍然存在分歧。他国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国情、政策调整的实际效果也难以仅靠个别数据来准确评估。提升生育率的路径,根源在于准确把握生育率的影响机制。然而,由于对低生育水平的内在机制理解尚不清晰,政策宽松化调整后能否有效实施、能否切实提高生育率、国外相关生育支持措施对中国是否有借鉴意义等问题还有待实践检验。对政策与生育关系的机制性分析,成为低生育水平应用性研究进一步深入的“瓶颈”。

### 三、生育研究的拓展

中国生育研究在关注上述3个核心问题时,多遵循人口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以定量取向方法为主导,尚未呈现出国际生育研究中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对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探讨不足,对这些学科中广泛使用的定性方法少有涉及。近年来,少量的生育研究对中国生育文化的特点、个体生育观念与决策过程、特殊群体的生育困境等主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有助于理解和解释当前的低生育率,对构建本土化的生育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生育研究。具体而言,生育研究在人口学、经济学理论基础补充了文化理论,在定量方法基础上增加了定性方法,在以育龄人群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基础上关注了特殊人口、部分族群的亚人口研究,但这部分研究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 (一) 中国生育文化的特点

生育文化的探讨与生育意愿研究息息相关,因而可被视为对生育研究的拓展。在生育文化研究领域,人口学传统的定量分析方法并不常用,而文本分析、深入访谈、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等定性方法得到更多的使用。

生育文化被理解为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特征的文化类型,可从观念态度、习俗制度到婚育行为等不同维度进行观察。农村婚育观念的转变历程、生育观念的代际传递等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生育文化具有本土特色,且会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影响未来的生育趋势,是生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如就婚育的先后顺序而言,从先婚后育的规范性观念到

先育后婚观念的逐渐被接受,行动主体根据情势的变化会调整观念结构,重新生成规范助推部分传统内在精神复位,因此对于观念的讨论应当基于总体、过程和实质意义展开,而不能仅根据某一环节、现象和形式做出判断(张文军,2021)。生育观念的代际传递在父代与子代之间存在双向机制,效果不仅受场域自主性的制约,也受亚场域的制约,比如生活在农村生育男孩就是首要选择,而生活在城市则能接受生育两个女孩(吴帆、冯立琴,2020)。家庭与个人的关系、乡土文化、多民族融合是理解中国生育文化的关键点。如有学者通过“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生育叙事,认为新文化运动后个体主义生育观的产生,是对传统家庭伦理的重构,个人主义生育观并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姜瑀,2021);也有学者关注农村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村落的人际交往理解乡土文化中存在的男孩偏好,发现人情、礼节、关系、面子等村民所重视的社会规范赋予男性独特的社会地位与权力,并在生育阶段投射为男孩偏好(张爱华,2016)。与西方的男权理论不同,生育的男性偏好具有中国本土的文化特色,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有研究关注瑶族、回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生育文化(郑观蕾,2017;罗彦莲、马燕,2017;白玛措,2020),发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生育文化深受民族文化的影响。

然而,既有生育文化研究未能与当前主流的低生育率研究契合,低生育率与中国的文化特色存在何种关系,是深层次理解生育文化和生育水平低下的关键问题,而对生育文化影响机制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

## (二) 个体生育观念与决策过程

在生育政策宽松化背景下,生育主体如何做出较为复杂的生育决策,如何在微观个体层面实现生育观念的转变,是理解宏观生育转变的另一个拓展。相关研究多使用案例分析方法,其独特性在于能够呈现出生育中的决策过程。“如何”(how)的问题是定性研究在提问方式上的最重要特征(风笑天,2017),通过生育过程如何发生的提问,可构建出生育的历程,这是定量方法难以完成的。

首先,通过深入访谈获得的个人案例,揭示个人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实践过程。一般情况下,个案是一个独特故事的呈现,展示了宏观社会事件中微观个体的主观理解和客观行动。案例分析的最终目的不是解释当前具体的案例,而是通过典型案例的不断丰富,对不同情境下的变异性进行比较分析,达成获取一般性理论知识的目的。因此,积累典型案例,比较分析不同情境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态度和行为,是厘清生育影响机制的前提。例如,通过对瑶族老、中、青三代人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发现生育意愿的变迁与当地日常生活、社会结构的变迁密不可分,从观念层面补充了低生育水平出现的必然性(王钰文,2016)。女性在特定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如何做出生育决策的案例,呈现了不同因素影响下女性生育决策的不同走向(吴莹等,2016)。在育龄女性的生育实践研究中,女性是一个经历了生育医疗化的主体,女性主体在技术、文化、重建等多因素参与下理解



并构建母职(李彧白,2020)。在人口流动与留守过程中,现在的劳动体制向留守家庭转嫁再生产劳动,强化了性别权力,把生育责任女性化(王欧,2019)。

其次,通过口述史等历史分析方法考察和理解生育转变的宏观历史变迁进程中,个人的生育意愿如何变化。例如,有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效果与当地的制度有明显的关系,由于集体化时期的制度重塑了女性心智构念,使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明显下降,由此可解释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生育行为的明显下降(余成龙,2017)。

然而,定性研究的理论视野多局限于制度与文化的讨论,对于在主流研究中更受关注的生育成本的变化、育龄女性工作与家庭的冲突等问题很少进行深入的探讨,存在明显的不足。

### (三) 特殊人群的生育困境

特殊人群是在特定历史、社会、政策背景影响下形成的少数群体,解决他们的生育困难是应用性生育研究的责任。由于特殊人群的数据资料缺乏,对特殊人群的生育研究目前更多依赖于定性方法。例如,针对生育政策影响下的失独家庭研究,通过深度追踪52个失独者发现,失独者在面临独生子女死亡后,生活逐步发生异变,经历了“心理—结构”的双重边缘化路径,因此结合内部心理治疗和外部结构性帮扶才是应对的关键(徐晓军、张楠楠,2020)。在同性伴侣的生育研究中,通过深度访谈发现,同性伴侣在面对制度性障碍时,主要依靠主观能动性,运用多种生育策略和意义建构去适应社会(魏伟,2016)。在生育困难家庭的研究中,通过个案研究,在制度—文化—一个人的关系视角下发现,生育困难家庭受到身份贬抑,家庭只能采取避免熟悉社交情境,重新构建生育困难朋友圈,重塑关系网络以适应生活(邱幼云,2021)。关于特殊人群的生育研究有助于通过反向案例理解普遍的生育问题。然而,当前的定性方法主要用于研究特殊人群的生育困难,与普遍性生育问题研究缺乏呼应。

## 四、当前中国生育研究的主要问题与完善建议

从近年的文献数量上看,定量取向的生育研究更为普遍,发表论文数量更多,涉及的问题更加多元。而定性取向的生育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围绕几个特定的问题展开,存在明显的边缘化特点。一方面,多数生育研究遵循定量取向传统,围绕低生育率的描述、解释和应对策略等,注重数据估计、因素分析和政策评估,存在对主观态度类问题探讨不足、理论创新不够、政策建议较为笼统等问题。另一方面,一些研究采用定性方法聚焦生育文化、生育过程、特殊人群的生育困境等,注重文化理解和实地调查,存在对低生育问题关注不够、理论视角单一、研究主题边缘化的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结合生育观念、态度和文化,进一步拓展生育意愿相关研究。虽然学者们已经关注到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并对生育意愿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梳理,对生育

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但由于生育意愿的研究一方面关系个体的生育观念与态度,另一方面触及对生育文化的理解,而观念和态度类主观性指标以及文化因素在定量分析中较难度量和操作化处理,现有研究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个体观念、态度变迁和生育文化解释是定性研究的主要领域,目前定性研究囿于学科背景和理论视野,很少关注低生育水平问题。建议在生育意愿相关研究中,更加关注中微观层面生育观念与态度和宏观层面生育文化的变迁及作用,以回应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双双低于更替水平的现实。

第二,在低生育水平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对内在机制的深度解读。机制研究是在一定条件下对因果关系的探索和对稳定规律的寻找。中国生育转变与人口大规模流动、生育观念更新、生育政策调整、受教育水平提高等因素均有密切关系,但这些因素如何相互交织、层层递进、共同导致生育水平的下降,尚未得到明确的答案,现有研究因素分析较多,而机制性探索较少。从方法视角看,当前生育研究缺少对生育事件发生的历史过程、生育决策产生的具体经验故事的分析,研究者未能在生育行为发生的具体时空中展开研究。建议在既有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事件还原和过程回溯等深度挖掘低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以回应新时期提升适度生育水平的需求。

第三,兼顾普遍性特征和异质性表现,全方位展示生育变迁图景。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在回答的问题、研究程序、研究策略和研究工具上存在不同(风笑天,2019),定量研究的特点是揭示一般性规律,着力于寻找具有代表性的“平均值”;定性研究则着眼于典型事件和人群,探索异质性。定量研究通过生育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客观地呈现中国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现状,但变量往往囿于调查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现有的生育研究中,数据的主要来源是历次人口普查数据、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CFPS数据、CGSS数据、2017年全国生育抽样调查数据及各种区域调查数据等。无论是普查数据还是抽样调查数据,调查的变量均受到调查设计者的理论约束,低生育水平的解释性研究只能在有限的变量上展开,从而限制了研究者的创造性。建议从当前生育研究的核心问题出发,补充以定性研究的丰富的典型案例分析,把“讲数据”和“讲故事”有机结合,以便呈现现实世界的全貌。

具体而言,从2016年开始,中国陆续实施“全面两孩”和三孩生育政策。生育政策能否实现适度生育水平的目标,如何完善生育支持配套措施,使其有效保障生育政策的顺利实施?这是一个宏观问题,离不开对生育现实的分析,而定性方法难以回应这种宏观问题,需要使用数据对生育形势进行判断;这也是一个微观问题,因为生育政策有效实施的最终着力点在家庭的生育行为上,需要对家庭的生育机制有深入的理解,以便拿出具体的方案。此时最好选择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既要通过微观数据分析影响因素,又要结合典型生育案例的实地调查,更加明晰生育机制,使方案有实施的可行性;这又是一个应用问题,当前政策的实施效果影响着下一步政策走向,可以在试点或实施过程

中,使用访谈、观察等定性方法,及时发现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将有助于推动生育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 参考文献:

1. 白玛措(2020):《严肃的气球——西藏牧区妇女生育变迁》,《西藏研究》,第4期。
2. 陈滔、胡安宁(2020):《个体主义还是家庭主义?——不同生育动机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效应分析》,《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3. 陈卫(2019):《中国的两孩政策与生育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4. 陈卫民、李晓晴(2021):《阶层认同和社会流动预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兼论低生育率陷阱的形成机制》,《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5. 陈秀红(2017):《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6. 陈云等(2021):《生育政策变化视角下的二孩家庭收入流动性》,《人口研究》,第2期。
7. 风笑天(2017):《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差别及其结合》,《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
8. 风笑天(2018):《影响育龄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探索与争鸣》,第10期。
9. 风笑天(2019):《问题与路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中的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学习与探索》,第6期。
10. 葛玉好、张雪梅(2019):《房价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人口研究》,第1期。
11. 顾宝昌等(2020):《中国总和生育率为何如此低?——推延和补偿的博弈》,《人口与经济》,第1期。
12. 郭凯明等(2021):《结构转型、生育率选择与人口转变》,《世界经济》,第1期。
13. 郭志刚(2017):《中国低生育进程的主要特征——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启示》,《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14. 何兴邦(2020):《城市融入对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5. 黄镇(2018):《从产假到家庭生育假——生育政策配套衔接的制度逻辑与改革路径》,《云南社会科学》,第4期。
16. 贾玉娇(2019):《生育率提高难在何处?——育龄女性生育保障体系的缺失与完善之思》,《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第3期。
17. 姜全保等(2020):《中国生育水平的间接估计》,《人口与经济》,第4期。
18. 江涛(2020):《撤点并校政策降低了生育吗?》,《财经研究》,第11期。
19. 姜瑀(2021):《“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生育叙事》,《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20. 李戡白(2020):《生育事件中女性的身体经验与具身实践——基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调研》,《社会》,第6期。
21. 李子联(2016):《收入与生育:中国生育率变动的解释》,《经济学动态》,第5期。
22. 廖敬仪、周涛(2020):《女性职业发展中的生育惩罚》,《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
23. 罗彦莲、马燕(2017):《西北回族妇女生育文化变迁——以宁夏为例》,《回族研究》,第3期。
24. 卿石松(2020):《夫妻生育偏好变化及其相互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25. 邱幼云(2021):《身份贬抑与关系重塑——基于90后生育困难女性的个案研究》,《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
26. 宋健(2018):《近10年来中国人口学方法发展回顾》,《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27. 宋健、阿里米热·阿里木(2021):《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及家庭生育支持的作用》,《人口研究》,第4期。

28. 田艳芳等(2020):《儿童照料与二孩生育意愿——来自上海的证据》,《人口学刊》,第3期。
29. 王国军、高立飞(2021):《低生育意愿的一个解释:养儿防老向商业保险养老转变——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兰州学刊》,第2期。
30. 王金营等(2019):《中国生育水平、生育意愿的再认识:现实和未来——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北方七省市的数据》,《人口研究》,第2期。
31. 王军、王广州(2016):《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差异研究》,《人口学刊》,第2期。
32. 王欧(2019):《留守经历与性别劳动分化——基于农民工输出地和打工地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2期。
33. 王钰文(2016):《社会转型中的瑶族生育意愿研究——基于一个瑶族村落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研究》,第1期。
34. 魏伟(2016):《同性伴侣家庭的生育:实现途径、家庭生活和社会适应》,《山东社会科学》,第12期。
35. 吴帆、冯丽琴(2020):《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农村生育观念代际传递机制分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36. 吴莹等(2016):《谁来决定“生儿子”?——社会转型中制度与文化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社会学研究》,第3期。
37. 徐晓军、张楠楠(2020):《社会边缘化的“心理—结构”路径——基于当代中国失独人群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38. 闫晴(2020):《家庭生育的税收激励:理念跃升与制度优化》,《人文杂志》,第6期。
39. 杨华磊等(2018):《城镇化、外部性与生育水平》,《人口与发展》,第4期。
40. 杨雪燕等(2021):《低生育率时代儿童照顾政策的需求层次与结构——基于西安市育龄人群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第1期。
41. 余成龙(2017):《制度结构与心智构念的选择:集体化对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再形塑——基于农村妇女口述史的分析》,《中国农村研究》,第2期。
42. 曾远力、赵丹(2020):《社会分层与女性生育二孩决策——以广东省中山市为例》,《南方人口》,第6期。
43. 张爱华(2016):《村落日常实践中的男孩偏好——对河北上村生育偏好的文化分析》,《山东社会科学》,第9期。
44. 张丽萍、王广州(2020):《女性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水平变动影响研究》,《人口学刊》,第6期。
45. 张婷皮美、石智雷(2020):《“996”与低欲望社会:加班对结婚和生育影响的实证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46. 张文军(2021):《知变又知常:观念是如何转型的?——基于浙东屿村婚育观念的考察》,《社会》,第2期。
47. 郑观蕾(2017):《广西平地瑶的生育文化研究——基于富川瑶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48. 钟晓慧、郭巍青(2017):《人口政策议题转换:从养育看生育——“全面二孩”下中产家庭的隔代抚养与儿童照顾》,《探索与争鸣》,第7期。
49. 周立群、周晓波(2016):《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来自养老社会化的解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1期。
50. 庄亚儿等(2021):《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人口研究》,第1期。

(责任编辑:朱 犁)